第28卷 第1期
2009年2月

人 类 学 学 报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Vol. 28, No. 1
Feb. 2009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方元素"与早期人类文化进化格局

黄慰文[1], 侯亚梅[1], 高立红[2,3]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北京 100044;
2. 北京自然博物馆, 北京 100050; 3.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49)

摘要: 本文回顾和分析中国旧石器研究史上有关"西方元素"即西方旧石器文化标志性技术和工具问题的争论, 得出三点结论: 1)"西方元素"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是与西方同类技术和工具大体同步出现的客观现象, 两者无本质差别; 2) 和西方一样, 中国旧石器的"西方元素"也有重叠与穿时性。这使得旧大陆两侧的旧石器文化连成一体, 难分东西; 3) 基于以上事实, 本文作者倾向于认为: 迄今已知的旧大陆旧石器文化是过去200多万年间早期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应对全球气候波动引起的生态环境变迁而反复进行的横贯大陆的双向迁移、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关键词: 旧石器文化; "西方元素"; 重叠与穿时性; 进化格局
中图法分类号: K87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193(2009)01-0016-10

1 导言

旧石器考古是19世纪中叶欧洲兴起的一门学科。经过莫尔蒂耶(Gabriel de Mortillet)、柯孟特(Victor Commont)、佩罗尼(Denis Peyrony)、步日耶(Henri Breuil) 和博尔德(François Bordes)等几代人的努力, 到20世纪中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旧石器文化分期序列。它以欧洲冰期—间冰期地层和共生哺乳动物化石为基础, 并以和分期相联系的标志性技术和工具(又称"标准化石")为标志。建立分期序列是欧洲旧石器考古学走向成熟的标志。然而, 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标志性技术和工具有很宽的重叠和穿时(overlap & diachronic patterning) 性, 难以充当有效的断代依据[1]。不过, 标志性技术和工具毕竟是人类发展生产力过程中创新能力的体现, 是一种客观现象, 可以在研究早期人类文化进化上发挥其独特作用。

20世纪初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下, 内蒙古萨拉乌苏、宁夏水洞沟和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为旧石器考古学传入中国提供了契机。当然, 和任何新知识传播一样, 西方旧石器考古学落户中国也经历了一个外来理念、思维方法与本土实践磨合的过程, 其间伴随着一系列学术争论。关于欧洲旧石器文化分期序列及标志性技术和工具是否适用于中国成为争论的焦点。由于事关构建旧大陆早期人类文化进化格局等基本问题, 而且往往与各研究

收稿日期: 2008-04-11; 定稿日期: 2008-11-03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2006CB8064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72011)
作者简介: 黄慰文(1937-), 男, 广东台山人,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从事旧石器考古研究。
E-mail: huangweiwen@ivpp.ac.cn。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者的文化背景有关, 争论变得长期而复杂。

为了便于讨论, 本文姑且用“西方元素”作为欧洲、非洲、西亚和南亚旧石器文化标志性技术和工具的同义词, 而和东亚、东南亚的“本土元素”对应。不过, 需要说明的是, 无论“西方元素”还是“本土元素”, 其概念、涵义并非如字面上那样泾渭分明。事实上, “西方元素”并非单纯姓“西”, 而“本土元素”亦非单纯姓“东”。它们的出现和发育过程其实非常复杂, 不少细节仍有待进一步弄清。因此, 本文只是根据已知事实尝试通过“西方元素”来探讨旧大陆早期人类文化进化格局。

2　关于“西方元素”

2.1　手斧问题

欧洲旧石器初期以阿修尔文化(Acheulean)为代表, 手斧、薄刃斧和手镐被看作其基本元素, 其中又以手斧最具标志性。1944 年莫维士(Hallam L. Movius)提出: “鉴于远东缺少典型的西欧序列, 现在已经清楚: 从旧石器初期开始, 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按不同生长模式独立发展的石核工具文化”[2]。他把东亚和东南亚广大地区称为“砍斫器文化圈”(the great chopper-chopping-tool complexes), 而非洲、西欧、西亚和印度半岛为“手斧文化圈”(the great hand-axe complexes)。这就是对旧石器考古学界影响深远的“两种文化”理论(亦称“莫氏线”假说)。其实, 此论并非莫氏首创, 有关争论早在周口店研究初期即已开始。

周口店石器工业, 包括第 1 (北京直立人遗址)、13 和 15 地点的石制品是中国旧石器初期工业的重要代表。第 1 地点按地层和动物群时代定为中更新世。1978 年以来经多种同位素测定和古地磁研究, 显示约 50 m 厚的含人类活动遗迹地层的顶部(第 1—3 层)为距今 30 万年左右, 而底部(第 10—13 层) 则可追溯到距今 70 多万年。第 13 地点和第 15 地点时代则分别相当于第 1 地点底部和顶部[3]。周口店早年考古学研究由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和裴文中负责。他们在报告中把“未发现手斧”和“几乎完全缺乏火石原料”作为周口店石器工业有别于以燧石手斧为特色的欧洲旧石器初期文化的要点[4]。1937 年, 裴在一次国际讨论会上称: “根据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研究, 中国猿人文化的年代同法国和英国的阿布维尔文化(Abbevillian)、早期克拉克当文化(Clactonian)相当。但二者的工具, 无论型式和工艺都是很不相同的”。“由于制造工具所采用的原料不同, 对于欧洲、亚洲的不同人类, 要从工具本身来表现欧、亚之间旧石器文化的更详细的关系是不可能的”[5]。德日进强调: 考虑到中更新世所代表一个巨大的时间跨度, 东亚“给人的印象是, 它一直(正如历史时代的中国, 以及它和地中海地区的强烈反差)是一个孤立的和自给自足的地区。它拒绝了任何重大的人类迁徙波浪”[6]。

1931 年 10 月法国史前考古学家、即裴文中后来赴法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步日耶应邀来华指导周口店考古研究。与德、裴不同, 他肯定周口店有手斧。1935 年 6 月他在巴黎一个会议上介绍周口店之行时说: “在看到了早年从上角砾层发掘出来的废土中有两三件用当地石灰岩粗制的手斧之后, 我曾想根据自己的发掘来验证一下是否有相当的数量”[7]。据裴早年的报告, 周口店第 15 地点除了手斧和薄刃斧外, 还出土莫斯特期流行的盘状器和勒瓦娄哇尖状器等制品[8]。第 13 地点出土了 1 件燧石“手斧”[9]。不过, 裴在 50 年代以后的出版物里对上述石器的分类名称都做了“去西方化”处理[10]。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对中国手斧的第二场争论围绕丁村石器展开。1953 年于黄河中游支流山西汾河第 3 阶地发现了多个地点组成的丁村遗址。次年从介于早更新世泥河湾期砂岩与晚更新世马兰黄土之间的河流砂砾层中发现 3 颗人牙、2000 多件石制品和 25 种脊椎动物化石。贾兰坡根据地层和动物化石将遗址时代归入中更新世晚期[11]。次年他又以“在中国发现的手斧”为题报道了几件丁村手斧, 指出:“在中国的广大土地上, 不仅在旧石器初期的地层里发现有手斧, 而且在中期也有发现”[12]。裴不赞成丁村手斧。在他执笔的正式报告里, 丁村石器由“砍砸器”、“单边形器”、“多边形器”、“厚尖状器”、“小型尖状器”、“刮削器”和“球状器”等组成, 遗址时代定在晚更新世早期, 结论强调丁村石器“无论在中国和在欧洲从前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文化”[13]。

丁村发掘是自第二次大战周口店发掘被迫中断以来中国第一个由本国科学家独力完成的重大旧石器考古项目, 备受外界关注。当莫维士读到 1955 年 1 月《科学通报》上有关丁村的几篇报告 (上述报告又于同年 9 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专集) 后, 立即著文评述。令人遗憾的是, 他错失了修正“两种文化”假说的好机会。他除了提出遗址时代应归入末次间冰期的见解外, 完全照搬裴的分类名称[14]。与莫氏成鲜明对照, 步日耶看了裴寄去的丁村报告后, 立即致信自己当年的学生表示不赞成把丁村石器归入“砍斫器工业”。他从报告插图中挑出几件“砍斫器”, 认为应正名为阿修尔手斧。步氏上述意见是我们从他逝世后裴撰写的一篇纪念文章里得知的[15]。同样, 1975 年访华的芝加哥大学弗里曼(L. G. Freemam, Jr) 看了丁村标本后, 用“绝对相称”、“没有问题”、“完美典型”等用词评价丁村手斧、手镐和其他阿修尔工具。他写道:“我对(丁村) 手斧系列深感惊喜 ……我确信它们属于标准的阿修尔系列, 存在的变异亦处于可预想的范围之内”, 相信“看过丁村采集品之后, 人们对在中国发现真正的阿修尔或似阿修尔工业将不会感到惊讶”[16]。

从 1975 年起王建主持了丁村遗址自 1954 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调查和发掘, 取得了多项突破。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扩大了“丁村文化”的时空范围。首先,“丁村遗址”从过去限于汾河左岸 11 个地点扩大至两岸共 26 个; 而时间上将过去单纯 1 期扩大为 3 期, 即在第 3 阶地的“旧石器中期”之外, 增加了第 4 阶地的“旧石器早期”和第 2 阶地的“旧石器晚期”。此外, 早期和中期石器除重型工具外, 增加了过去未受足够注意的轻型工具。晚期文化在保留一些重型工具的同时, 出现了早、中期未见的细石器。其次, 报告指出丁村文化中“砍斫器不发达”的事实[17]。今天, 尽管人们对“丁村文化”时代看法不一, 但新发现则清楚地表明至迟在中更新世晚期, 一个含手斧、薄刃斧、手镐、球状器等“西方元素”而“砍斫器不发达”的石器工业已扎根汾河流域。

此后, 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流域河谷相继发现大批含“西方元素”的旧石器初期工业。其中, 北方洛南和南方百色的发现具有关键意义。洛南与其近邻蓝田均在陕西境内, 都是黄河中游的黄土盆地。洛南旧石器发现于上世纪 70 年代, 90 年代以来在王社江主持下取得重要进展。迄今为止, 盆地内已发现 268 处旷野地点, 采集石制品 13 579 件。这些制品大多分布在华北黄土序列第 5 古土壤层以上的离石黄土剥蚀面上或层中, 年代大约从距今 50 万至 25 万年(后者为光释光年龄)。而个别地点则达到距今 80 万年[18, 19]。洛南石器原料以石英岩为主, 来自当地河流砾石层。工具中手斧和手镐比例均超过 10%; 砍斫器、薄刃斧、尖状器和石球各占 5% 左右; 雕刻器和大型石刀比例很低。上述工具除部分直接用砾石和岩块打制外, 81.67% 以石片为毛坯。石制品中还出现勒瓦娄哇龟背状和盘状石核。距今 50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万至 20 万年是欧洲手斧文化的主要发展期。洛南石器为东西方文化对比提供了一个时间相当而技术和类型学亦能很好对比的范例。

广西百色盆地自 1973 年起在长约 100 km 的右江(属珠江水系)两岸高阶地上发现旧石器地点 80 多处,地表采集与发掘出土石制品达 2 万多件。石器层位为底砾层之上的网纹红土。裂变径迹和氩/氩法对与石器共生的玻璃陨石进行测定分别得出距今 73.3 万和 80.3 万年的结果[20,21],比已知欧洲手斧文化大约早了 20 万年。百色石器用当地河流砾石层的巨砾、粗砾为原料,岩性以石英岩、砂岩和硅质岩居多。这些原料因节理发育而大大制约了技术的发挥,使百色石器多半具有器身厚、石皮多等外观。不过,对使用部分的打制则相当到位[22]。

以保全状况比较好的枫树岛地点为例,除了重型工具外,还有一定比例的普通石片工具和少量以脉石英和燧石为原料的两极法制品。后者在百色尚属首次报道。重型工具有手斧、手镐、薄刃斧、砍斫器、盘状器和石锤;普通石片工具有刮削器、鸟喙状器、凹缺器和锯齿刃器。手斧和手镐是石器中加工最精致、数量最多的工具。手斧多以大石片为毛坯,而手镐则多半用粗砾直接打制。手斧的打制经过选择毛坯、粗打、定形、去薄和精修等程序,有相当数量制品修理把手。手镐的加工不及手斧规范和精细。薄刃斧以打制大工具过程中产生的“修整石片”为毛坯,尺寸比其他重型工具小,不规范,数量也不多。2002 年 9 月本文前两位作者到印度半岛东北部奥里萨邦(Orissa)考察,不仅发现该地手斧文化与百色石器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而且确认那里含手斧文化的地层是和百色盆地一样的网纹红土。因此,百色手斧的发现无异在“莫氏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大缺口。

2.2　勒瓦娄哇和石叶技术制品问题

欧洲旧石器中期以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为代表,传统上从里士—玉木间冰期(Riss-Würm Interglacial)开始,大约为距今 12.8 万年;结束于玉木冰期前段的间冰阶(Würm I/II Interstadial),不晚于距今 3.4 万年至 3.5 万年[23,24]。也有人主张莫斯特文化可上溯至距今 15 万年或更早。不过,大多数欧洲莫斯特遗址处于距今 8 万至 3.5 万年[25]。莫斯特文化以预制石核技术和用其产生的石片加工不同比例的边刮器、琢背刀、手斧、锯齿刃器和尖状器为特征。

博尔德认为莫斯特文化是一种“混合或复合的”多类型、可能起源不同的文化。仅法国就可分成典型莫斯特、基纳—费拉西或夏朗德莫斯特、锯齿刃器莫斯特和阿修尔传统莫斯特等多个类型。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变种。例如,匈牙利距今 5 万年的塔特(Tata),石器一般用小卵石打制,刮削器占很高比重,没有太多勒瓦娄哇技术制品。意大利的蓬廷(Pontinian)石器,因尺寸太小而被称为“微型莫斯特”[24]。近年,一些考古学家在诠释欧洲旧石器中期的技术基础时不再突出勒瓦娄哇技术,而采用“配套工具是用从预制石核上打下的毛坯所制”来表述[26]。这是考虑到莫斯特文化的多样性,而勒瓦娄哇只是预制石核技术之一而做的“微调”。欧洲旧石器晚期从夏代尔贝龙文化(Chatelperronian)出现(距今 3.4 万年至 3.5 万年)开始。距今 1 万年左右随末次冰期结束而进入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晚期文化以流行用石叶工具为特色。这一时期的文化元素还包括艺术品、垂饰和骨器等[26]。

1973 年 8 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东亚早期旧石器会议上,一些与会者以东亚缺少西方旧石器中期和晚期文化元素为由,建议用“前期旧石器”(“Early Paleolithic”)和“后期旧石器”(“Late Paleolithic”)两分模式取代欧洲旧石器文化 3 期模式来划分东亚旧石器文化[27]。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不过, 这种主张不新鲜。至少莫维士早就提出了[2]。说东亚旧石器缺乏西方中期和晚期元素不合事实。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步日耶就明确地将水洞沟工业定性为一个“处于十分发达的莫斯特文化和初生的奥瑞纳文化之间的半路上, 或者是两者结合”的工业[28]。60 年代博尔德重新观察收藏在巴黎的水洞沟标本后, 完全认同步日耶的结论。他说: 水洞沟工业“确实是一个够格的勒瓦娄哇技术莫斯特文化。它具备很有代表性的石叶制品(31% 的石叶或石叶工具) , 27% 刮削器, 16. 6% 锯齿刃器, 28% 的旧石器晚期类型的工具(端刮器、雕刻器、钻具、偶尔出现的琢背刀、石片和截断石叶) , 少量手斧(大约 2% , 与步日耶提供的数字成鲜明对照) , 以及大约 2% 的砍斫器。此外, 还有盘状器、细石叶和一些裂片 (splintered pieces)”[24]。贾兰坡等发表的中苏考察队 1960 年发掘材料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0 年发掘报告也得出类似结论[29, 30]。80 年代以来水洞沟遗址的年代学研究获得重要进展: 铀系法(兽骨) 34 ± 2ka BP, 38 ± 2ka BP; ^{14}C 17. 25 ± 2. 1ka BP(兽骨) 和 26. 23 ± 8ka BP(钙质结核) 等[31]。中美学者合作用 AMS ^{14}C 测定出土的灰烬、炭屑获得距今 2. 9 万至 2. 4 万年的结果[32]。上述测年和步日耶对工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评估大体吻合。

根据布勒(Marcellin Boule) 和德日进关于萨拉乌苏哺乳动物群不是“寒冷动物群”的分析[28], 萨拉乌苏遗址应归入末次间冰期。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对地层剖面的多学科分析研究表明遗址不晚于距今约 7 万年[33]。然而, 不少研究者对于把萨拉乌苏石器归入旧石器中期心存疑虑。萨拉乌苏石器多半用从尺寸很小的卵石上剥下的石片加工而成, 被步日耶称为“纯正的细石器(purement microlithique) ”[28]。据 1980 年出土材料测量统计, 工具平均长度为 18. 1mm, 最大的 1 件尺寸为 55mm × 35mm × 13. 2mm, 但却是孤例。有 1 件雕刻器只有 7. 5mm × 11mm × 3mm[34]。也许正是由于萨拉乌苏石器特别细小而给人以“进步”的印象, 以至有人将它安置到晚更新世之末。然而如前述, 欧洲旧石器中期除了我们熟悉的“典型莫斯特”以外, 也还有像萨拉乌苏石器这类“微型莫斯特”。

不久前报道的藏北高原第二大湖色林错东南岸海拔 4600 m 古湖滨阶地发现的旧石器令人惊喜[35]。这些主要用灰黑色燧石板岩打制的石制品包括石片、石核和工具。观察表明已经使用预制石核技术。用形状比较规整的石片加工的工具有边刮器、鸟喙状器、凹缺器、锯齿刃器和“坎松尖状器”(de Quinson, 法国旧石器中期遗址) , 都是欧洲莫斯特文化的常见类型。许多欧洲流行的技术在色林错都可以看到。例如, 工具刃部台阶状修整。这是欧洲旧石器中期修整技术的重要特征之一, 被称为“基纳修整法”。又如, 阿修尔的“去薄”技术在色林错得到很好继承。青藏高原湖泊大多保存了完好的湖滨砂砾堤。它们是气候变化导致湖面升降的结果。色林错产石制品的湖滨砂砾堤高出今湖面 70 m。地质、地貌研究以及同位素年代测定, 表明该阶地形成于末次盛冰期之前的间冰阶, 与深海氧同位素第 3 阶段晚期相当, 年代在距今 4 万至 3 万年前后。这一判断与现代人类学关于藏族人在生理和基因结构上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稳定占据高海拔地区的现代人, 以及他们大约在距今 2. 5 万至 5 万年时已涉足青藏高原的研究结论吻合[36, 37]。

中国产石叶的遗址还有山西的峙峪和下川等。峙峪遗址位于山西北部, 为河流阶地沉积, 上覆厚层粉砂层(可能相当于马兰黄土) 。出土大量石制品、单个兽牙和有明确的人为砸击、刮切痕迹的破碎兽骨。共生的动物化石包括河套大角鹿、王氏水牛、最晚斑鬣狗、披毛犀、野马、野驴、马鹿、普氏小羚羊和原始牛等萨拉乌苏动物群成员。石器原料有石英岩、硅质灰岩、石髓和黑色火成岩等。打片采用锤击、两极打击和间接打击[38]。据本文第一作者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藏的标本观察，峙峪石器大多数是用小石叶或截断石叶为毛坯，类型有尖状器、边刮器、端刮器和锯齿刃器等。峙峪遗址的 AMS ^{14}C 年龄为 32.20ka BP[39]，大于原先的常规^{14}C年龄 28.945±1.37ka BP。不过，同上述遗址地层和动物群显示的古老性质仍有不够协调之处。未来进一步工作不排除年代提早的可能。

下川遗址位于山西南部的中条山一个小盆地，石制品出自河流阶地和坡积物中。1970 年起由山西考古学家多次发掘，发现大量石制品[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随后又进行更大规模发掘并收获颇丰，可惜迄今未见正式报告。下川石制品由优质燧石等原料打制，有石叶和细石器制品。另外有少量脉石英、砂岩和石英岩打制的类型简单的大石器。石叶工具有端刮器、边刮器、尖状器、钻具、箭头、雕刻器、锯齿刃器和琢背刀等。下川石制品技术先进，类型规范，间接打击和压制技术表现清楚，总体面貌与风格十分类似欧洲旧石器的中、晚期文化。由于缺乏动物化石，下川的研究者曾花大力气进行^{14}C年代测定。然而给出的数据似乎过于分散。仅 1991 年公布的 19 个数据，其范围就从 13510±300 BC 至> 33700 BC[41]。可能受石制品技术与类型先进等因素影响，研究者对“宽幅”年代不放心，而采用距今 2.4 万至 1.6 万年的折中年代来定位下川工业[42]。其实，今天看来这种疑虑不一定必要。因为在与我国邻近的东北亚，甚至国内一些新发现的产类似工业的遗址所涵盖的时间幅度比下川的测年结果还大。

旧石器晚期文化其他元素在中国也有发现。例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周口店山顶洞遗址的葬俗、垂饰和骨器，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的垂饰、小骨盘、骨针、鱼义和矛头，以及河北兴隆县一处洞穴遗址的刻纹鹿角，等等[43]。它们都能够和欧洲同类制品很好进行对比。

2.3　重叠与穿时现象

和西方旧石器标志性工具与技术一样，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方元素”也具有很宽的重叠和穿时性。例如，中国发现手斧的遗址已经从最初零星分布的几个扩大到黄河、长江、珠江流域和东部沿海，覆盖了今天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温带和亚热带广大地区。其中，占据黄河中游汾渭地堑的手斧文化区，已成为连成一片的中国旧石器文化分布区中最大的一个。它的时间跨度从早更新世延伸到晚更新世，长达 100 多万年。

被西方学者当作代表东亚的旧大陆最早阿修尔手斧之一的蓝田平梁手斧[44]，层位相当于公王岭“蓝田人”化石层之下的古土壤层[45]。按照安芷生等建立的公王岭遗址黄土序列，这件手斧的年代应早于距今 115 万年的“蓝田人”[46]。而按调整后的中国黄土序列年代[47]，平梁手斧的年代应大于距今 130 万年。另外，考虑到安等建立公王岭黄土序列时对剖面存在的地层缺失未予足够注意，因此“蓝田人”及平梁手斧的年代有可能被大大地低估了[48]。总之，东亚手斧与近年报道的东非（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距今 160 万或 165 万年的“最早手斧”[49]的年代上不会相差太大。

勒瓦娄哇制品在西方出现的时代也从原先的旧石器中期提早到了初期。法国南部产勒瓦娄哇制品的奥尼亚克（Orgnac 3）遗址年代为距今 30—35 万年[1]。而据近年报道，可以看作原型勒瓦娄哇石核的标本令人意外地出现在距今 164 万年坦桑尼亚佩宁杰（Peninj）遗址的“奥杜韦文化”层[50]。中国的勒瓦娄哇技术制品也至少可以追溯到中更新世。例如，贵州盘县大洞工业包含相当数量的修理台面石片，以及一批类似于勒瓦娄哇龟背状石核、勒瓦娄哇尖状器和“石核桌面”（core tablet）等与预制石核技术关联的制品[51]。铀系法、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表明该遗址已发掘的厚约 4 m 的堆积层的年代从距今 29.4 万年至 15.6 万年[52,53]。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令人感兴趣的是, 在新出土的距今 80 万年百色枫树岛石器材料中出现一些可能与手斧“去薄”有关的石片是用类似于勒瓦娄哇技术所产生(报告正在出版)。另外, 本文第二作者等命名的距今 110 万年的华北泥河湾盆地“东谷坨定型石核”已经具有明确的修理台面特征[54]。

2.4 “西方元素”的真实性

既然“西方元素”在时代相应的中国旧石器文化中都可以看到, 那为什么学术界对此迟迟未能达成共识呢? 过去, 我们曾单纯归因于东亚缺少一个和西方接轨的类型学体系。上世纪 60 至 70 年代, 以博尔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用十多年时间通过讨论和磨合, 建立起至今仍在非洲和欧洲通用的旧石器类型学体系。然而, 肩负旧大陆“半壁江山”研究重任的中国学者由于历史原因错失了参与机会。加上这个空档正好被莫维士杜撰的有严重缺陷的分类体系所填充, 造成至今仍未消除的负面影响[55]。

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外交流逐渐恢复, 情况有所改善。然而, 总的局面未见扭转。看来, 缺少统一的类型学体系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怀默(John Wymer) 在评论丁村手斧争论时说:“中国考古学家们不情愿将这些工具称为手斧, 是担心这样做会和非洲、欧洲阿修尔工业挂钩”[56]。我们想他的话有道理。平心而论, 今天恐怕还不能说每一位中国同行在分析旧石器材料时已经摆脱我们头脑里“万里长城”的束缚。当然, 西方同行也有他们自身的问题。他们头脑里也有一道“马奇诺防线”。自古希腊罗马时代以来就形成的“东方就是东方, 西方就是西方”思维方式在许多西方人头脑里根深蒂固。他们习惯于将非洲与亚洲视为分开的两个大陆, 心里总觉得那块遥远而神秘的大地属于“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之域。他们不甘心轻易承认“远离世界文明中心”的东亚竟能产生同西方技术不相上下、而时代不见得比西方晚的旧石器。例如, 说丁村和百色手斧虽然两面打制, 但未经“精修, 第二步修整和阿修尔手斧的边缘定形”, 不算“真正的手斧”, 其出现与阿修尔技术传统无关[57]。事实上, 丁村手斧表面上所保留的那些长度越过器身中线的片疤正是“去薄”的明证。而手斧边缘的细小片疤则是制造者为了使工具边缘整齐、轮廓端正而“精修”时留下的。也许正因为如此, 步日耶和弗里曼才明确地将丁村石器定性为真正的阿修尔。至于百色手斧,《科学》上展示的 3 件手斧中的两件就具有标准的“去薄”和“精修”特征[21]。

勒瓦娄哇技术和制品的问题亦如此。步日耶和博尔德对水洞沟工业直接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近年, 随着认识提高在中国识别出的这类制品也就多了起来。总之, 怀疑中国旧石器文化“西方元素”的真实性既与事实不符, 也不必要。

3 讨论和结论

1) 西方旧石器文化的标志性技术和工具, 即本文所说的“西方元素”, 在相应的中国旧石器文化中都能看到。它们不是偶尔地、零星地, 而是成序列地(阿修尔工业—莫斯特工业—石叶工业) 和以成套工具(tool-kit) 的形式(如阿修尔工业的手斧、薄刃斧和手镐组合) 出现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之中, 扮演着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角之一;

2)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方元素”也具有西方一样的重叠与穿时性。正是这种特性使旧大陆两侧的旧石器文化连成一体, 难分东西;

3) 基于以上事实, 本文作者倾向于认为: 迄今已知的旧大陆旧石器文化是过去 200 多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万年间, 早期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应对全球气候波动所引起的生态环境变化而反覆进行的横贯大陆的双向迁移、交流与融合的结果。既然“两种文化”理论早已“漏洞百出”[58], 那么, 为早期人类文化进化格局构建一个替代范式已是摆在世界旧石器考古学界面前一项不该回避的挑战。

本文为纪念对发展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奋斗终身并做出重大贡献的贾兰坡院士诞辰一百周年(1908—2008)而作。

参考文献:

[1] Monnier G. The Lower/Middle Paleolithic period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06, 47(5): 709-744.

[2] Movius H. Early man and Pleistocene stratigraphy in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M].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1944, 19(3).

[3] 黄慰文. 周口店北京直立人遗址[M]. 2007, 北京: 文物出版社.

[4] Black D, Teilhard de Chardin P, Young CC, *et al*. Fossil man in China[M]. Memoirs of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S. A. 1933, (11).

[5] Pei WC. Paleolithic industries in China[A]. Early Man, Philadelphia, 1937: 221-232. 转引自安志敏译“中国的旧石器文化”. 见: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150-157.

[6] Teilhard de Chardin P. Early Man in China[M]. Institut de Géo-Biologie, Pekin, 1941.

[7] Breuil H. L'état actuel de nos connaissances sur les industries paléolithiques de Choukoutien[J]. L'Anthropologie, 1935, 45, 740-746.

[8] Pei WC. A preliminary study on a new Paleolithic station known as Locality 15 within the Choukoutien region[J]. Bull. Geol. Soc. China, 1939, 19(2): 147-187.

[9] Pei WC.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Locality 13 in Choukoutien[J]. Bull. Geol. Soc. China, 1934, 13(3), 359-367.

[10] 裴文中.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C]. 见: 郭沫若等: 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5: 53-89.

[11] 贾兰坡. 山西襄汾县丁村人类化石及旧石器发掘简报[C]. 见: 郭沫若等, 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5: 91-104.

[12] 贾兰坡. 在中国发现的手斧[J]. 科学通报, 1956, (12): 39-41.

[13] 裴文中、贾兰坡. 石器研究[M]. 见裴文中主编: 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97-111.

[14] Movius H. New Paleolithic sites, near Ting-Ys'un in the Fen river, Shansi province, North China[J]. Quaternaria, 1956, 3 Roma: 12-26.

[15] Pei WC. Professor Henri Breuil, pioneer of Chines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and its progress after him[M]. Separata de “Miscelán en Homenaje al Abate Henri Breuil”, tome 2, Ripoll, E. ed., 1965, 2: 251-271.

[16] Freeman LG. Paleolithic Arche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in China[M]. In: Paleoanthrop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SCPRC Report, 1977, (4), 79-113.

[17] 王建, 陶富海, 王益人. 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J]. 文物季刊, 1994, (3): 1-75.

[18] 鹿化煜, 张红艳, 王社江, 等. 东秦岭南洛河上游黄土地层年代的初步研究[J]. 第四纪研究, 2007, 27(4): 559-567.

[1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地区文管会、洛南县博物馆编著. 花石浪(I)——洛南盆地旷野类型旧石器地点群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20] Guo S, Huang W, Hao X, *et al*. Fission track dating of ancient man site in Baise, China, and its significances in space research[J]. Radiation Measurements, 1997, 28(1-6): 565-570.

[21] Hou Y, Potts R, Yuan B, *et al*. Mid-Pleistocene Acheulean-like stone technology of the Bose basin, South China[J]. Science, 2000, 287(5458): 1545-1700.

[22] 黄慰文, 何乃汉, 佐川正敏. 百色旧石器——中国广西百色遗址群手斧的对比研究 II[M]. 日本国东北学院大学文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学部考古学佐川研究室, 2001.

[23] Oakley K. Frameworks for Dating Fossil Man[M].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Chicago, 1964: 142.

[24] Bordes F. The Old Stone Age[M].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 Toronto, 1968.

[25] Brooks A. Mousterian[M]. In: Ian Tattersall *et al*. eds. Encyclopedia of Human Evolution and Prehistory, Garland Publishing, New York & London, 1988: 360-363.

[26] Otte M, Kozlowski.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Middle to Upper Paleolithic in North Eurasia[J].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01, 3(7): 51-69.

[27] Ikawa-Smith F. Introduction: the Early Paleolithic tradition of East Asia[M]. In: Early Pal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ed. by Fumiko Ikawa-Smith. Mouton Publishers. The Haque, Paris. Distributed in the USA and Canada by Aldine, Chicago, 1978: 1-9.

[28] Boule M, Breuil H, Licent E, *et al*. Le Paléolithique de la Chine[M]. Archives de L'Institut de Paléontologie Humaine, 1928, Memoire 4.

[29] 贾兰坡, 盖培, 李炎贤. 水洞沟旧石器遗址的新材料[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64, 8(1): 75-86.

[30]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水洞沟——年发掘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31] 黄慰文, 侯亚梅, 袁宝印, 等. 中国北方的旧石器晚期文化[M]. 见: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旧石器时代论集——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周 80 年》,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8-16.

[32] Madsen D, Li J, Brantingham P, *et al*. Dating Shuidonggou and the Upper Paleolithic blade industry in North China[J]. Antiquity, 2001, 75: 706-716.

[33] 黄慰文, 董光荣, 侯亚梅. 鄂尔多斯化石智人的地层, 年代和生态环境[J]. 人类学学报, 2004, 23(增刊): 158-271.

[34] 黄慰文, 侯亚梅. 萨拉乌苏遗址的新材料: 范家沟湾 1980 年出土的旧石器[J]. 人类学学报, 2003, 22(4): 309-320.

[35] 袁宝印, 黄慰文, 章典. 藏北高原晚更新世人类活动的新证据[J]. 科学通报, 52(13): 1567-1571.

[36] Moore LG, Niermeyer S. Zammudio, S. Human adaptation to high altitude: regional and life-cycle perspective[J]. Yearbook Phys Anthropol., 1998, 41: 25-64.

[37] Beall C. Adaptations altitude: A current assessment[J]. Annu Rev Anthropol., 2001, 30: 423-456.

[38] 贾兰坡, 盖培, 尤玉柱. 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72, (1): 39-58.

[39] 原思训. 加速器质谱法测定兴隆纹饰鹿角与峙峪遗址等样品的^{14}C年代[J]. 人类学学报, 1993, 12(1): 92-95.

[40] 王建, 王向前, 陈哲英. 下川文化——山西下川遗址调查报告[J]. 考古学报, 1978, (3): 259-288.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M]. 北京: 文物出社, 1991: 39-41.

[42] 王建. 下川文化[M]. 见: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568-569.

[43] Huang W. Greeting Chines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n the 21st Century (A Retrospective)[J]. Acta Anthropologica Sinica, 2000, supplement to 19: 104-114.

[44] Potts R. Acheulean[M]. In: Ian Tattersall *et al*. eds Encyclopedia of Human Evolution and Prehistory. Garland Publishing, New York & London, 1988: 3-6.

[45] 戴尔俭. 陕西蓝田公王岭及其附近的旧石器[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66, 10(1): 30-32.

[46] An Z, Ho CK. New magnetostratographic dates of Lantian Homo erectus[J]. Quaternary Research, 1989, 32: 213-221.

[47] Ding ZL, Derbyshire, Yang SL *et al*. Stacked 2.6-Ma grain size record from the Chinese loess bassed om fore sections and correlation with the deep-sea δ 18 record[J]. Paleoceanography, 2002, 17(3): 1033.

[48] 黄慰文. 中国旧石器文化序列的地层学基础[J]. 人类学学报, 2000, 19(4): 269-283.

[49] Torre I, De la Mora R, Martinez-Moreno, J. The early Acheulean in Peninj (Lake Natron, Tanzania)[J].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008, (27): 244-264.

[50] Torre I, De La R Mora, M. Domínguez-Rodrigo, *et al*. The Oldowan industry of Pinij and its bering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skills of Lower Pleistocene hominids[J]. Human Evolution, 2003, 44: 203-24.

[51] 黄慰文, 侯亚梅, 斯信强. 盘县大洞的石器工业[J]. 人类学学报, 1997, 16(3): 171-192.

[52] 沈冠军, 刘军, 金林红. 盘县大洞遗址年代位置初探[J]. 人类学学报, 1997, 16(3): 211-230.

[53] Jones HL, *et al*. Coupled electron spin resonance (ESR) uranium-series dating of mammalian tooth enamel of Panxian Dadong, Guzhou province, China[J].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4, (31): 956-977.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

[54] Hou YM. The "Donggutuo core" from Donggutuo industry of Lower Pleistocene in the Nihewan basin, North China and its indication[J]. L'Anthropologie, 2008, 112(3), 451-471.

[55] 黄慰文. 东亚和东南亚旧石器初期重型工具的类型学——评 Movius 的分类体系[J]. 人类学学报, 1993, 12(4): 297-304.

[56] Wymer J. The Paleolithic Age[M]. Croom Helm London, 1982: 79.

[57] Corvinus G. Homo erectu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questions of the age of the specie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tone artifacts,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handaxe-like tools[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04, 117, 141-151.

[58] Tobias PV. One hundred years after Engene Dubois: the Pithecanthropus Centennial at Leiden[J]. Human Evolution, 1993, 25: 523-526.

"Western Elements" in the Chinese Paleolithic as Viewed in a Framework of Early Human Cultural Evolution

HUANG Wei-wen[1], HOU Ya-mei[1], GAO Li-hong[2,3]

(1.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4;
2. *Beijing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Beijing* 100050;
3.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39)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western elements" (or marked techniques and tools in western Paleolithic) in the Chinese Paleolithic. Two conclusions were reached in this paper: 1) The Chinese Paleolithic "western elements" are an objective phenomena that show similar developmental steps and basic characters found in both the East and West; 2) The Chinese Paleolithic "western elements" show characters of overlap and diachronic patterning as is found in the West.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e authors view the known Paleolithic cultures from Europe, Asia and Africa as the result of bi-directional movements of migration, diffusion, exchange and a blend of early human cultures between West and East as early as two million years ago, which occurred as a response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s.

Key words: Paleolithic cultures; Western elements; Diachronic patterning; Evolutionary framework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